

紀念章中看歷史

無論在香港還是中國內地，學習歷史、了解歷史的途徑其實非常之多。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方法，便是觀察各種古跡以及人文展覽之中所展出的紀念章。紀念章所蘊含的價值，並不是紀念章本身所具有的文物意義或是工藝材質，而是其背後的歷史象徵與人文內涵。從這個角度上看，紀念章所表現的歷史書寫方式，其實是一種理性客觀的歷史事實和人們內心的感性歷史圖景的一個高度融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敘述中，包含着相當之多的歷史主題和時代意義，例如革命、戰爭、階層利益與權利的爭取等。近代化本身是一個與外部世界接軌的過程，因此在歷史事件的描述之中，紀念章被賦予了較為特殊的內涵。紀念章代表榮譽，更代表着在歷史敘述之中，人與歷史之間的相互關聯和地位比較。因此，紀念章具有無盡的歷史回憶功能。

創建共和、保衛共和

共和，此一詞語在中國文化的內涵中，真正與西方意義上的Republic相對接，其實是來自於近代。它成為了當時中國人探求未來國家道路和國體的根本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歷史上的思潮思想論戰之中，曾經產生過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之間的大辯論。其實就本質而言，二者都是立憲政體。但是共和派堅持認為，中國必須廢除帝王，將國家的最高元首作為人民主權的象徵。因為從形式層面來看，哪怕是在立憲政體之下，君王雖然不掌握實權，但是仍舊世襲其統治地位，且居於國家元首之位，從這個角度而言，無法形成人人平等的架構。因此，共和政體，實際上是追求一種在人格尊嚴意義上的平等價值。

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後，新成立的共和政府，無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基於對共和政體的尊重，會頒發勳章或者紀念章作為對參與共和革命有功人士的一種榮譽補償。共和革命紀念章的意義在於，紀念章本身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授勳體制在中國確立的表現；同時，與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的政權更迭不同，古代的皇權更替，往往會為有功的文臣武將頒發免死金牌，作為對其征戰以及出謀劃策的表彰，可見其延續的仍舊是家天下的思維。但是共和革命的差異在於，在理論上所確立的是全體國民的公意所形成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基於主權在民、人人平等的共和精神，免死金牌的制度固然取消了，代替的便是紀念章。

在紀念和表彰辛亥革命的紀念章中，如武昌起義重要領導人熊秉坤，便獲得了五位章。這一紀念獎章呈現出十字形，在設計上帶有極為強烈的西方藝術色彩。就紀念章的色調而言，為了突出國家觀念以及共和國體的確立，紀念章呈現出的是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的組合，這



■武昌起義紀念館

一色彩恰好與當時新生的共和國的國旗色彩相同並吻合。可見，紀念章完全滌蕩了皇權專制的色彩，具有氣象一新的共和精神。

不單單是熊秉坤，武昌起義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向海潛，其獲得的文虎勳章，也是由前文所述的五種色彩所構成。所不同的是，文虎勳章中的虎，帶有極為強烈的中國水墨畫色彩，是中國傳統藝術的體現。文虎，代表着勇猛背後的人文精神。這也是中國進入共和時代之後所倡導的主旨。

除了建立共和之外，保衛共和也成為了紀念章的一大題材。袁世凱背叛民國稱帝之後，以雲南領導人蔡鈞為



■農民協會徽章

首的南方將領，組織了護國軍，討伐袁世凱。保衛共和紀念章便是這一歷史背景的寫照。這一紀念章，實質上是由雲南當地的護國軍政府頒發，帶有濃厚的雲南地方色彩。在五色共和國旗兩側的馬和雞的圖案，代表着雲南昆明的金馬碧雞坊，那是護國軍誓師出征的地方。因此，可見共和價值已經成

為全國化的思想產物。

農民運動的寫照

除了革命與保衛共和，其實社會階層的權利爭取運動，也成為了紀念章製作的一個重要題材。1924年，

當時由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奉行聯俄方針，並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國民革命的歷史中，開始逐漸發動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比例和數量的農民階層。而這一切，首先的工作便是在各地建立農會，並在廣州建立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運動的幹部。

伴隨農運而產生的紀念章，帶有那個時代鮮明的特色。記者在廣州農講所展覽看到，農運的紀念章，最為鮮明的特色便是鋤頭——這一代表農民生活的根本器械。中國古代一直都是以農立國，歷代帝王也往往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可見，農民問題是中國一直以來，被執政者所高度關注的問題。在古代，也往往是農民起義對政權的打擊最大。

邁入近代特別是革命時代之後，解決農民與土地的問題，成為了當時的革命者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時的國民革命運動以及北伐戰爭，農民的支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將鋤頭高高舉起，當時對農民的重視以及解放，不僅僅是土地分配的變更，其實更是農民尊嚴的一次提升。這在中國歷史上是較具突破性的一次嘗試。

香江的艱困歲月

在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中，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香港被日本佔領的歲月，給老一代香港人留下了極為痛苦的回憶。伴隨着戰爭與佔領的，是當時香港人的反抗運動。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便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這是當時在香港已經被日軍佔領之後，仍舊與日軍進行作戰的一支武裝力量。

港九獨立大隊的紀念章，呈現出紅色以及五星狀。在本港舉行的一些與抗戰有關的歷史題材的展覽中，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往往都會佩戴這枚紀念章。這些老耄老者所希望的，便是後人能夠銘記這段歷史。

有學者向記者表示，紀念章或者獎章，本身是西方的一種榮譽美學的產物，但是流傳入東方，必然會結合本地化的文化移植與塑造。不僅僅有本土藝術的表現形式，同時也有本土或是在地化的地標符號，有時設計上也會加入更加合乎社會思潮的元素。這些組合，在某種意義上都使得紀念章成為了敘述歷史、了解歷史的一個非常便利的平台。



■文虎勳章



■護國戰爭紀念章



■五位章



■港九獨立大隊紀念章

學堂樂歌中的文化革新

晚清中國開始逐步確立近代化教育，一個又一個學堂的建立，衝擊着中國舊日的教育體制，也給中國人的文化思維觀念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新式學堂的教育不再局限於科舉八股，而是將人文、數學、理工、醫學等知識，納入到教育體系中，從而形成晚清教育發展中，有關新學和舊學的巨大論戰和爭執。

新學與舊學，前者代表近代化的學堂教育，後者則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衛道士。二者之間的激烈衝突，源自於究竟該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外來世界中的一些先進事物。在洋務運動初期，不少守舊派政界人士以及清流士大夫，將近代化意義上的新學，視為是沒有倫理色彩、只是滿足於機關技巧的小把戲。在他們的眼中，科舉之學，乃是人心之學，上乘之學。

不過這種觀念，伴隨着甲午戰爭中，清國的失敗而被邊緣化。隨即而來的爭論，已經不再是排斥舊學，而是中體西用，將近代化意義上的西學視為手段，而將傳統儒家思想觀念的「中學」，視為是根本目的，主張二者齊頭並進。

從新學與舊學爭論一開始，有一種超脫論爭的教育形式，成為了至今影響無數中國人的藝術源泉——學堂樂歌。學生在近代化意義上的教育體系中，其人文思想與藝術情操的培養和開導，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音樂或是歌唱的能力訓練。與傳統

■《民報》成為啟發晚清留學生的重要書籍



中國與日本曾經共有不少學堂樂歌，被不少中國留學日本的藝術家傳入中國。中國的文學家們又重新進行了填詞，以更加合乎中國人的審美標

意義上的中國民歌不同，學堂樂歌帶有極為強烈的新型教化、近代化價值觀以及強烈的國家觀念。

例如，《勉學歌》、《中國男兒》等歌曲，便是積極主張當時的中國人要意識到國家處於危急存亡狀態的警戒之中，應當為挽救國家的危亡和富強而努力，開始着力培養中國人近代化意義上的國家觀念。

另一種類型的學堂樂歌，則帶有明顯的蒙學、教化以及審美色彩。例如《早春賦》、《送別》等。以《送別》為例，其在日本更被稱之為《旅愁》。而令人津津樂道的《友誼萬歲》，在日本則被稱之為《螢之光》。在日本，這支曲子被大量運用在畢業典禮、軍艦出海等告別場合中，直至今日仍舊如此。在舊有的歌詞中，《螢之光》的日語歌詞，不僅僅懷念同窗歲月，也不僅僅表達對朋友離別的傷感，同時還強化了極為濃厚的軍國色彩。也正因為如此，在二戰結束之後，歌曲中帶有軍國色彩的歌詞，被刪除。

所以，當彼時的清國處在封閉之時，日本則齊頭並進；當日本開始重拾國粹、國學的時候，中國又進入西化的狀態。兩國同為東亞國家，但是在近代以來的歷史脈絡中，則看出各自命運的感歎和差異。



■留日學生編纂的刊物

準。不過一個值得發人深省的事實是，當學堂樂歌大舉進入中國的生活領域時，也就代表着中國人在當時的文化審美上，與歐美社會開始走近。但恰恰是在中國奮力學習西方的時候，日本卻又走回到了傳統的道路中，開始強調國粹文化、國學文化。與明治、大正兩位日本天皇在位時期的音樂作品、特別是學堂歌曲風格相比，昭和時期的日本音樂，已經開始國粹化，風格也就帶有強烈的本土色彩。

所以，當彼時的清國處在封閉之時，日本則齊頭並進；當日本開始重拾國粹、國學的時候，中國又進入西化的狀態。兩國同為東亞國家，但是在近代以來的歷史脈絡中，則看出各自命運的感歎和差異。

文、攝：徐全